

# 韩国“新村运动”起因研究

陈刚华 (高丽大学政经学院, 韩国首尔 136701)

**摘要** 通过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和农业经济自身发展3个层面对韩国“新村运动”的起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韩国“新村运动”是当时韩国政治、社会经济、农业自身发展途中的一次必然的选择。

**关键词** 韩国农业; 新村运动; 农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D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08)18-07939-07

## Research on the Cause of "Saemaeul Movement" in South Korea

CHEN Gang-hua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Korea University, Seoul 136701, South Korea)

**Abstract** In the paper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cause of "Saemaeul Movement" in South Korea was summariz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politics, the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elf-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Based on the analyses, three main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Firstly, the movement was just a political tactic of Park Chung-hee government to please civilians for maintaining its own illegal power. Secondly, in view of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ovement was an obligatory measure to close the prominent economical gap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Thirdly, the agriculture of South Korean at that time had become a stumbling obstac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reformation accordingly beca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summary, Korea Saemaeul Movement was a necessary choic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 Korean politics, social economy and agriculture.

**Key words** South Korean agriculture; Saemaeul Movemen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韩国的“新村运动”,由朴正熙总统在1970年发起,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旨在改变韩国当时农村落后面貌的一场农村运动。此项运动开展不久就从农村波及到了工厂、学校及城市,迅速地在整个韩国扩散开来,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超常规发展的模式。“新村运动”堪称是农村开发的经典案例,引起许多国家领袖的兴趣,并纷纷派学者、专家或农民直接到韩国观察学习。这些成功的经验已被许多国家引用,同样这些经验也对我国现行的“新农村运动”有一定的借鉴作用。2006年2月,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最高领导层与来自31个省、市的200名干部同吃同住,用1周时间专门学习、研究“新村运动”,并一致认为,韩国“新村运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模式<sup>[1]</sup>。鉴此,分析韩国“新村运动”的发生背景、发起原因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查阅大量相关文献、数据统计资料、总统演说稿等,进行整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韩国的“新村运动”进行较科学、系统的理论分析。

### 1 “新村运动”在政治层面的需要

朴正熙通过1961年5月16日的军事政变,结束了韩国第二共和国(1960年4月~1961年5月)短暂的党权生涯。以朴正熙为首的军人虽然用武力推翻了民主政府,却标榜自由民主,发动政变的军方势力在政变成功之后,紧接着发表了《1.16军事革命公约》,其主要内容有:遵守联合国宪章并巩固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关系;消除一切腐败和旧恶并振兴民族精神;解决经济困难并推动经济建设;为民族统一强化能够与共产主义对抗的实力;一完成以上诸项任务,即把政权让给政界并退回到原来的职业上<sup>[2]</sup>。从这些内容来看,此公约包含着很强的实践性质,强调通过掌握和运用手中的权力来达到某种目的。

在经济建设方面,军政政府继承并以公告的形式确定第二共和国时期开始制定的国土开发计划,并决定反映在国家

预算上。从军政当局所公开发表的经济政策来看,要建立在自由经济为基础却含有很强计划性的经济体制<sup>[3]</sup>。在整个第三共和国时期,行政机构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经济企划院。经济企划院对中央政府各部门拥有统辖权,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个综合性经济整合机构。而且,把经济企划院院长的级别提高到副总理一级,即由专设的副总理兼任经济企划院院长。到第三共和国以前为止,在韩国政府职位设置上没有过副总理一职。在这一经济企划院里划入了预算职能,从而强化了预算和企划之间的联系。除此之外,还采取了劳动厅、农村振兴厅的增设和恢复建设部等措施<sup>[4]</sup>。

在行政改革方面,军政政府为了把行政次序带入“较好状态”而从外部做了许多努力<sup>[5]</sup>,到军政时期(1961年5月~1963年12月)结束时,不到3年的时间,军政政府就对《政府组织法》进行了11次修改。这段时期行政改革的主要特征<sup>[6]</sup>:一是军事政变主要势力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定为国家的主要目标,政府组织的改编也围绕这一目标进行。最突出的表现是经济企划院的设置以及劳动厅、农村发展厅、铁厅、水路局、传播局等实务部门的设置。二是1964年6月为推进强有力的行政改革,设置总统直属机构——行政改革调查委员会<sup>[7]</sup>,这是第一共和国以来第一个专门的推进改革的机构。但是,该委员会没有能发挥预期的作用,而且逐渐变得名存实亡<sup>[8]</sup>。三是行政改革中更强调行政效率和目的性。在经济开发之初,官僚权限的加强及专业化加强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四是试图在公共行政部门实施军队的组织管理制度。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企划调整官制度的实施。军政时期在内阁中设置企划管理官室,在企划咨询委员会和各部、处、厅分别设置了企划调整官室<sup>[9-10]</sup>。五是第二共和国时期行政组织上的特征可视为中央集权制的加强。权力中心在于总统,内阁逐步转变为被动的执行机构。行政改革也采取从上到下的方式。并且在组织机构及管理方面,因权力的高度集中,下设机构要绝对服从。

这些改革的主要原则要求是行政的民主性和效率性;分离企划和执行的2个职能,并设置能够调整和评价政策和企

**作者简介** 陈刚华(1976-),男,江西南昌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行政、中韩农业政策、社会与政策运动。

**收稿日期** 2008-04-19

划的机构;控制职能的制度化;组织部门的合理编制;相近部门的整合;把有关公共项目的政府部门改革为企事业性的管理体制;把集中在中央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强有力地推动国土建设计划等。在这一军政期间进行的行政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开发与管理机构的增设和强化。

从朴正熙的《我们国家的道路》以及其他资料来看,发展经济是他最大的愿望,其他一切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上来,“1956年5月16日的武装革命应当被理解为我们现代史上的发展民族使命为取得经济独立而进行民主革命的真正起点”<sup>[11]</sup>。关于朴正熙为什么这么执著地追求经济发展的原因,有研究认为,一是朴正熙出身于极度贫寒的家庭并在贫困中成长,对此他自己也有回顾<sup>[2]</sup>。二是他对时代的认识而产生的使命感,他在反省本民族苦难历史的基础上指出,要么是重建,要么就是毁灭。在这个关头能否作出正确选择是对自己民族命运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考验。因为,这个时代是不发达国家出现革命骚动的时代,是不发达国家为了发展经济而开始参与竞争的时代<sup>[11]</sup>。三是为自己发动军事政变并掌握政权寻求合法性根据,他说:“除非让人民看到成绩,否则人民是不会合作的”<sup>[11]</sup>。总而言之,第三共和国注定要大力推动经济建设,并且政府必须担当首要任务<sup>[4]</sup>。这样的政策,甚至到了第四共和国都由于国家最高领导人没有发生变化,这时期的国政运行基本上与第三共和国差不多。更加把国政的重点放在经济发展上<sup>[3]</sup>。朴正熙从1961年5月通过军事政变夺得政权到1979年10月被刺身亡长达18年的执政生涯中,他大力发展经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了他掩盖政治的非法性的重要手段,使当时的人民相信,他领导的政府是有能力的政府,使自己的不法政府合法化。城市工业的快速发展,为他赢得了市民的支持,为了得到包括农村居民的拥护,进行农村地域的开发,也是必然。这就是1970年开始进行的“新村运动”在政治层面的理由。

## 2 “新村运动”在社会经济发展层面的需要

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在朴正熙总统的倡导下,开始了以城市工业化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心。通过短短的几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工业化带来的收益就渐渐地显现出来,整个国家的GDP有了很大的提高;外汇收入得到了不断的增加;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慢慢地提高。但是,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农村的相对落后开始显现出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地被拉大。另外,随着城市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城市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强;城市对周边地区人口的吸收也越来越强。因此,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到了城市。由于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农村土地的弃耕、荒芜现象越来越多,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和妇女化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由于城市人口过于密集,就业问题、社会治安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严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使整个经济和社会能够良性循环,处于60年代末的朴正熙政府迫切需要对整个农村社会经济进行一次大的改革。这也就是韩国“新村运动”出现的原因之一。改革从农村开始后来燃烧到了工厂、学校,继而燃遍了全国,最后成了一场对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精神大改造的全民大运动。通过“新村运动”,当时

非常严峻的农村贫困化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农村居住者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地缩小,甚至有一段时期还有所超越。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新村运动”整个韩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精神面貌得到了大大的改善,这也为韩国以后的经济快速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也存在着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的问题,那就是随着城市工业化的进行,农村人口的流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萎缩,城乡收入和地区间收入的不断扩大,同样也发生在韩国的发展过程中。

在“新村运动”进行以前的20世纪60年代初,朴正熙政府开始实行城市工业化。由于工业化,产生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也随着城乡收入的拉大,导致了城市周边农村大量人口涌入了城市。1960年全国的农业人口数为1.456万,占据了总人口的58.3%;到1970年,也就是“新村运动”的开始之年,农村总人口虽然增长到了1.581万人,但占总人口的比率却下降到了44.7%;到了1980年“新村运动”临近结束之际,农村人口已下降到了只有1.083万人,只占总人口的28.4%,短短的10年,人口比率就下降了16.3个百分点(表1)。

表1 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

Table 1 Ratio of rural population in national population

年度	总人口 万人	农村人口 万人	比率 %
Year	Total population	Rural population	Ratio
1960	2 498	1 456	58.3
1970	3 537	1 581	44.7
1980	3 813	1 083	28.4

注:资料来源于韩国农林部的《农林统计年报1981》。

Note: Data came from the 1981 Statistical Annual Report o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农村人口急速的减少,带来了因农业劳动力不足而导致的深刻社会问题。在农村流入到城市的人口中,大部分是年轻的青壮年劳动力,因此,农村中的老龄化、妇女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甚至在部分农村中出现了农业劳作后继无人的现象。从50岁以上农村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率情况来看,在1960年只占14.8%;到1970年“新村运动”开始之年就达到38.2%;到了“新村运动”快要结束的1980年,这个比率则高达到了46.1%(表2)。

表2 农业劳动者的主要年龄别构成

Table 2 Main age constitu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er %

年龄 Age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40 岁未満 Under 40	-	35.2	23.0
50 岁以上 Above 50	14.8	38.2	46.1

注:资料来源于韩国农林水产部的《农业基本统计》。

Note: Data came from Agricultural Basic Statistics.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工业化的不断深化,农业在整个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率和所起的作用也在不断地下降。根据韩国农林部的《农林统计年报1981》,1965年农业还占国民经济(GDP)的36%;到了1970年下降到了26.7%;到了1980年就下降到了只占14.9%。由此可以看出,以前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农业已渐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随着农业主导地位的丧失,农业经济所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自然地越来越小。农民只依靠从事农业所得的话,生活将

很难维系,农民不得不依靠从事其他农业外活动来增加自己的所得。1970~1980年,农民的农外收入从62万韩元快速增

长到了938万韩元,10年增加了15倍,1980年,农民的农业外收入占到了总收入的34.8%(表3)。

表3 农民收入构成比率

Table 3 Constitution ratio of farmers income

年度 Year	农民收入 万韩元 Farmer income	农业收入 万韩元 Agricultural income	农业外收入 万韩元 Income of non-agiculture	农业外收入所占比率 % Proportion of non-agicultural income
1970年	256	194	62	24.2
1980年	2 693	1 735	938	34.8

注:资料来源于韩国农林部《农林统计年报1981》。

Nte: Data came from the 1981 Statistical Annual Report o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不仅城市和农村的差异越来越大,就连农村之间,也随着地域的不同,发展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由于城市近郊拥有较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多地方渐渐地被城市化,因此,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开始流入到了这里,

最后,造成了流动人口超过了当地人口。随之人口混住带来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化;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边远农村人口急剧下降。就拿京畿道来说,由于地靠首都首尔,这样的变化最为明显(表4)。

表4 各道地域人口变化

Table 4 Regional population changes

年份 Year	京畿 Gyeonggi do		江原 Kangwon do		忠北 Chungcheongbuk do		忠南 Chungcheongnam do		全北 Chollabuk do	
	人口 Population	万人占比 Proportion %	人口 Population	万人占比 Proportion %	人口 Population	万人占比 Proportion %	人口 Population	万人占比 Proportion %	人口 Population	万人占比 Proportion %
1975	23.90	100.0	14.44	100.0	12.24		23.45		18.73	
1980	25.54	106.9	12.12	83.9	9.72	79.4	21.84	93.1	16.10	86.0

  

年份 Year	全南 Chollanam do		庆北 Gyeongsangbuk do		庆南 Gyeongsangnam do		济州 Jeju do		合计 Total	
	人口 Population	万人占比 Proportion %	人口 Population	万人占比 Proportion %	人口 Population	万人占比 Proportion %	人口 Population	万人占比 Proportion %	人口 Population	万人占比 Proportion %
1975	29.45		31.42		2.27		2.77		1.79	100.0
1980	25.55	86.8	26.69	84.9	19.50	85.9	2.95	106.0	160.02	89.3

注:资料来源于韩国内务部的《新村运动10年史(资料篇)》。

Nte: Data came from the Ten Year History of New Village Motion.

由表4可以看出,1975~1980年的6年间,只有京畿道和济州道的人口在上升,而其他道的人口都在下降。其中以忠清北道下降的速度最快,下降了20.6个百分点。另外,到

1979年末为止,京畿道的农村收入和其他地域相比,也相对的处于优势地位(表5)。

表5 1979年末各道农村收入分布

Table 5 Rural income distribution in 1979

各道 Each do	农村数 个 Number of villages	收入 万韩元 Income						
		400 以上 Above 400	300~400	260~300	220~260	180~220	140~180	140 以下 Below 140
京畿 Gyeonggi do	4 010	16	424	1 177	1 877	503	12	1
江原 Kangwon do	2 202	4	36	116	923	1 033	90	-
忠北 Chungcheongbuk do	2 525	2	98	690	1 401	332	2	-
忠南 Chungcheongnam do	4 307	19	151	771	2 504	859	3	-
全北 Chollabuk do	5 057	17	187	695	2 280	1 668	208	2
全南 Chollanam do	6 211	10	195	1 028	3 188	1 727	63	-
庆北 Gyeongsangbuk do	5 447	3	89	741	3 264	1 345	5	-
庆南 Gyeongsangnam do	4 924	8	122	473	2 226	1 994	101	-
济州 Jeju do	188	6	16	40	67	59	-	-

注:资料来源于韩国内务部《新村运动10年史(资料篇)》。 Nte: Data came from the Ten Year History of New Village Motion.

另外,随着城市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农村和城市之间在收入方面差距也越来越大,同时在其他方面的差距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如,医疗、保险、社会福利各个方面,农村都处于下风。所以到了1970年代的韩国,急需对农村进行一场大的

改革,这也就是“新村运动”为什么首先选择在农村展开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新村运动”,韩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些成果使落后的农村有了新

的气息,农村的基础设施得以改善;农民的收入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甚至于在一段时间内还超越了城市;别外在医疗、教育福利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最为可喜之处是“新村运动”使整个韩国的国民变得空前的团结。“新村运动”这场改革给韩国农村甚至整个韩国在经济和社会精神各个方面带来巨大变化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根本的改善。1970 年“新村运动”实施开始,发展到1980 年,在这10 年当中,农村的各项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基本面来看,农村的生产基础有了明显的改善,村中道路铺设、农路改善、小桥梁的架设等实际完成情况都比1971 年当初设定的目标要高,甚至超过了许多;在农外收入方面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另外,在生活环境方面,村会馆建设比起住宅改良、乡镇改善方面都占据了相对高的位置。可以说,从1970 年开始到1980 年结束的“新村运动”,在生产基础、农外收入、生活环境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表6)。

表6 主要农村事业促进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promoting main countryside enterprises

部门 Department	项目 Item	计划值 Planned value	实绩 Actual performance
生产基础	村中道路铺设 km	26 226	43 553
	农路改善 kg	49 167	61 797
	小桥梁架设 个	76 749	79 516
	仓库 栋	34 665	22 143
	作业场 个	24 665	6 263
	导水路 km	4 043	5 161
	小河川整理	17 239	9 677
农外收入	畜舍 个	32 729	4 476
	村工场 个	950	717
	造林 hm <sup>2</sup>	967 362	642 804
生活环境	村会馆 栋	35 608	3 012
	住宅改良 千户	544	225
	村庄构造改善 个	-	2 747
	乡镇改善 个	1 529	843

注:计划值为1971 年设定,累积是到1980 年止。资料来源于韩国内务部《新村运动10 年史(资料篇)》。

Note: The planned value was designed at 1971, and the accumulated performance terminated at 1980. Data came from the Ten Year History of New Village Motion by Ministry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Home Affairs.

(2) 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新村运动”的影响波及到了整个韩国的各个方面,这是个不争事实。首先拿“居民所得”这个能直接反映城市和农村之间生活水平的指数来看,1970 年“新村运动”开始的当年,农民家庭所得只占城市家庭所得的67.1%,但在1974~1977 年,随着“新村运动”不断地成功开展,农村家庭收入超过了城市家庭的收入,特别是在1974 年这个比率达到104.6%,就是到了“新村运动”即将结束的1979 年,这个比率也高达到84.7%。农村和城市劳动者收入差距被缩小亦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换句话说,“新村运动”对农民收入的增大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表7)。

(3) 医疗、文化福利改善。1970 年随着“新村运动”点火实施,并迅速在全韩国蔓延,很快成为了振兴韩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伴随着农民意识的提高和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农民

对于文化、医疗福利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对自身和家庭健康的关心。与此同时,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强,提高农民的医疗、文化福利的意愿也就变得越来越强烈。医疗活动。政府对无医的村庄和岛屿采取了移动诊疗方法,积极组织各种移动医疗小组,自带医疗设备进行巡回诊治活动。医疗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通过移动医疗活动,全国的急性传染病率逐渐呈下降趋势。1970 年,传染病的患病人数为每10 万人中96.6 名。经过持续的预防接种和对传染病的控制,到1978 年下降到了每10 万人中只有26.2 名。对于偏远农村农民实施的口腔疾病预防活动也取得了很大成绩,1970~1979 年共为107.7 万的农民进行了口腔疾病方面的治疗。另外,通过政府补助、免费的方式,对医疗脆弱地区农民进行的例行检查和BCG 疫苗接种活动,使1970 年结核病发病率的4.2%下降到了1980 年的2.3%。再后来,通过对抗结核的2 次用药,使结核病的患病率下降到了只有1.6%,达到了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除此之外,还开展了各种移动医疗、免费医疗活动。如,水产业协同组合部通过船舶医院,1972~1979 年共对57.5 万渔民进行诊疗;还有许多军队医科大学的学生,利用假期定期开展医疗活动。医疗保障立法。从1977 年1 月4 日开始实行的医疗保险制度,目的是为了帮助那些得了病而不能入院治疗的低收入阶层和健全整个社会的活动。并在1977 年实行的《生活保护法》中,把无生活能力和低收入者也列入了医疗保险的对象,包括149.7 万的无偿医疗患者和184.8 万名的低收费的有偿患者。其中山村农民和岛屿农民患者占到了60.4%。1978 年制定了《医疗保障法》和《施行规则》,又追加了灾民和性病者作为援助的对象。这样一来,无偿医疗的患者就高达220.7 万名,一般的低收费有偿患者也达到了187.7 万名。如果按区域划分的话,当时总的受诊人数为95.9 万名,其中市区受诊人员达42.8 万名,占全体的44.6%;农村受诊人员达53.1 万名,占全体的55.4%。另外,1977~1980 年,国家和地方投入的财力达2 652 200 万韩元,受益人数达2 510.1 万人(表8)。

表7 各年度农户所得和城市家庭所得比较

Table 7 Comparison of annual farmers income and urban family income in each year

年 份 Year	农户所得(A) 万韩元 Farmers' income (A)	城市家庭所得(B) 万韩元 Urban family income	比较A/B % Comparison A/B
1970	25.58	38.12	67.1
1971	35.64	45.19	78.9
1972	42.94	51.74	83.0
1973	48.07	55.02	87.4
1974	67.45	64.45	104.6
1975	87.29	85.93	101.6
1976	115.63	115.18	100.4
1977	143.28	140.51	102.0
1978	188.42	191.63	98.3
1979	222.75	262.96	84.7

注:资料来源于韩国内务部。

Note: Data came from the Ministry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Home Affairs.

医疗保障制度作为一项特别的事业在韩国社会福利政

表8 各年度医疗保障工作成绩

Table 1 Work performance of annual medical security

年度 Year	受益人数 万人 Benefit people	投资额 万韩元 Investment amount		
		国费 National cost	地方费 Local cost	合计 Total
		1977	469.3	373 700
1978	788.2	555 800	185 200	741 000
1979	827.4	658 100	219 400	877 500
1980(6 月末)	425.2	401 600	133 900	535 500
合计	2 510.1	1 989 200	66 3000	2 652 200

注: 资料来源于韩国内务部《新村运动10 年史(资料篇)》。

Nte: Data came from the Ten Year History of New Village Motion.

策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项制度的建立成为构造医疗体系的基础,意义深远。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一方面,能够使生活困难的低收入人群得到医疗,另一方面也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因为良好的医疗保障缩小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医疗差距,对地域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国民和国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4) 就学热情高涨。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把“新村运动”作为契机,呈现出了对子女教育非常高的热情。在一项有关对农民子女教育热情度的调查中,回答“有很大的提高”的比率高达54.3%;“一定程度提高”的比率为36.4%，“其和过去一样”的比率为6.4%，“反而下降”的比率只有2.9%。从中可以肯定地得出,农民对子女教育的热情越来越高(表9)。

表9 对农民子女教育热情度的调查

Table 9 Investigation on the public enthusiasm on rural children education

问题 Problem	回答人数 人 Answer number	比率 % Ratio
很大的提高	245	54.3
一定程度提高	164	36.4
和过去一样	29	6.4
反而下降了	13	2.9

另外,1977~1980 年学生的就学率也是越来越高,1977~1980 年,就业青少年回校接受再教育的人数每年也都在增加,1977 年回到初中和高中学校的青少年只占全体青少年数的

3.0%,但是到了1980 年这个数值就增长到了14.5%(表10)。

表10 青少年再教育成果

Table 10 Education result of youth reeducation

学校 College	分类 Classification	年份 Year			
		1977	1978	1979	1980
初中	就学对象劳动者 人	254 047	253 849	252 407	251 523
	特别学校就学者 人	2 373	6 819	10 240	11 232
	比率 %	0.9	2.7	4.1	4.5
高中	就学对象劳动者 人	313 006	345 963	379 425	410 307
	特别学校就学者 人	6 537	76 001	31 733	44 488
	比率 %	2.1	4.6	8.4	10.0

注: 资料来源于《新村运动10 年史(资料篇)》。

Nte: Data came from the Ten Year History of New Village Motion.

由表10 可以看出,随着“新村运动”的不断深入,全国上下对知识的渴求被空前地激活,人们的就学热情也是空前的高涨。

(5) 精神方面的改善。根据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思·韦伯的理论,物质文明的提高,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精神文明的提高,但是这种提高是有阶段性的。如,人们在相对贫困时,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内在精神财富也会随之增长。但当物质文明极丰盛之时,人们的精神文明就不一定会随之提高,有可能还会发生下降<sup>[13]</sup>。韩国从20 世纪70 年开始推行的“新村运动”,不仅创造了较高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随之提高,有人把它称作为“新村精神”,也叫作“新村运动精神”。其中,勤劳、自助、协作、自立被称作为新村精神的4 个基本要素,当然还可以包括其他一些要素,如坚定、诚实、俭约、利他主义和牺牲,这些要素贯彻在整个“新村运动”的过程中,成为了共同追求的目标。根据韩国首尔大学的金光雄教授的研究,把“新村运动”10 年分为4 个不同的阶段,分别是:1970~1971 年为初期计划和试验阶段;1972~1973 年为着手期;1974~1976 年为确立期和1977~1979 年为成熟期。在这10 年中,新村精神的9 个基本要素在韩国总统的35 次演讲文中(其中朴正熙总统34 次,1979 年的崔圭夏总统1 次)出现的频率也是不同的,这反映出不同时期对精神要素所强调的不同。其中“勤劳”成为出现最频繁的词语,共计出现227 次,其次是“协作”218 次、自立95 次、俭约61 次和坚定31 次,诚实和利他主义分别为24 次<sup>[13]</sup>(表11)。

表11 新村精神要素的各阶段分布(1970~1979)

Table 11 Distribution of new village motion spirit elements at each stage

精神要素 Spirit element	计划期(1970~1971) Planning stage		着手期(1972~1973) Commence stage		确立期(1974~1976) Establishment stage		成熟期(1977~1979) Mature stage		合计 Total	
	出现频率 次 Frequency	占比 例 % Proportion	出现频率 次 Frequency	占比 例 % Proportion	出现频率 次 Frequency	占比 例 % Proportion	出现频率 次 Frequency	占比 例 % Proportion	出现频率 次 Frequency	占比 例 % Proportion
勤劳	65	30	112	31	36	29	14	23	227	30
自助	34	16	39	11	18	14	7	11	98	13
协作	55	16	102	29	41	33	20	33	218	29
自立	36	26	44	12	9	7	6	10	95	13
坚定	11	5	14	4	3	2	2	3	30	4
诚实	12	6	9	3	1	1	2	3	24	3
俭约	2	1	33	9	16	13	9	14	60	8
牺牲			1				1	2	2	

注: 资料来源于首尔大学新村运动综合研究所《新村运动的理念和实际》。表12、13 同。

Nte: Data came from the Spirit Elements and Fact of New Village Motion. The same as Table 12 and 13.

另外,1980年7月韩国内务部研修院对138名地方公务员关于“新村精神”变化认知进行调查。此次调查对象的年龄都在30~61岁,高中毕业以上文化,实际的工作经验在1~31年,其中以工作年数在15~20年的人为最多。此次调查的问题为“你对过去10年,新村运动精神持何种看法”,+10分为最肯定的看法,-10分为最否定的看法(表12)。

表12 地方公务员对新村运动的精神要素变化认知

Table 12 Cognition of spiritual denerts changes of local civil servants on new village motion

精神要素	分数	结果
Spiritual denert	Score	Result
勤劳	+5.43	肯定
自助	+4.95	肯定
协作	+5.11	肯定
自立	3.49	肯定
坚信	5.32	肯定
诚实	+2.39	肯定
俭约	-0.51	否定

从表12不难看出,被调查公务员的回答大部分是在接近于+5分的位置,也就是说,作为“新村运动”的间接指导者,他们对“新村运动”在精神方面的变化还是持很大的肯定意见。根据1975年首尔大学行政调查研究所,把3535名普通农民作为标本对象进行调查,结果见表13。

表13 普通农民对价值变化的认知

Table 13 Cognition of value changes of common peasants %

价值Rice	占比例	
	Differences of value change cognition in the two comparison years	
	1970年	1975年
勤劳	52	82
协作	47	76
坚信	54	78
利他	68	81
合理性	63	76

从表13可以看出,1975与1970年比较,勤劳、协作、坚定的变化上涨率都在20%以上,利他主义和合理性的变化上涨幅度也分别在13%以上。总之,韩国的“新村运动”在创造了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大大改变了韩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这种改变是全面的,并具有深远的价值意义。

### 3 韩国农业经济自身发展层面的需要

在近代韩国的国民经济中,农业所占GDP的比重一直都在50%以上,自从1955年韩国实行城市工业化以来,农业占GDP的绝对主导地位才开始发生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当然有经济发展的自然原因,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受重视的程度。韩国从1945年结束了日本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后又经过3年的美国军政统治阶段,到1948年韩国政府才得以成立,并于1949年6月颁布了《农地改革法》,次年3月又发布了“农地改革法施行令”。可是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之后,许多年都未能制定《土地法》来推进农村发展计划。直到1967年,工业化已经相对成熟时,韩国政府才颁布了用于发展农业的农业基本法。

韩国的农地改革原预定在1955年完成,可是就在农地改革刚进入实质阶段时,由于韩国战争的爆发,农地改革事业不得不暂时停止。也因为战争,有关农地改革的大部分资料遗失,给以后的改革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所以直到1957年12月31日,农地的收买、分配才告一段落。并且韩国农地改革后数年,农业生产力并无显著提高,韩国农地改革前后谷物生产的趋势,在1951~1952年由于韩国战争的影响生产力降低。其后,单位面积生产量呈不规则变化,其中当然有受自然力的影响和生产意愿低下,或投入的劳动力不足的因素,而更重要的是投入资本不足或技术落后的原因。韩国在初期农地改革成效很不理想是因为只顾到土地平均分配,而忽视了土地生产力的培养与农业长期持续的发展,最后改革的结果只是1949年6月21日当时预定的分配55592hm<sup>2</sup>土地的66.1%。农地改革,可以说是虎头蛇尾,甚至有学者认为韩国的农地改革是失败的。但是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政策中,并不缺少农业增产的政策,如“农业增产3年计划”、“第1个粮食增产5年计划”及“第2个粮食增产5年计划”等。都因为这期间的经济政策的重心在于工业设备的扩充和经济的安定,所以农业政策只能说是有名无实,这导致工农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到“第1个经济建设5年计划(1962~1966)”时期,也是因为实施安定优先政策,用农业来换安定。这期间实施的农业增产计划,也不过是以农业来配合工业,尤其是因低粮价政策,冻结了农产物的价格。而工业产品的价格却在不断上涨,结果导致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发生了严重的差距,给农民带来极大的负担。到了“第2个经济建设5年计划(1967~1971)”时期,韩国政府又由于经济、政治上的原因(经济方面,城乡收入差距悬殊,1967年农民平均收入只是城市人的一半;政治方面,农民的参政议政的意识越来越高),韩国政府也作出过一系列的改革,如取消了低粮价政策,并颁布了《农业基本法》,但农业生产仍处于停滞减产状态。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为了扩大出口,加大了对美国粮食的进口;对农业方面投资的减少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反观周边的台湾和日本,特别是台湾,有着与韩国相似的历史背景,也都是在1945结束了日本的殖民统治,百业待兴。1949年,我国国民党进驻台湾后,在台湾推行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政策。这些土地改革极具特色,一是土地改革以渐进的方式展开,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计划。一个步骤完成马上紧接着另一个步骤,所以整个过程只用了短短的8年(1948~1956)就宣告完成。二是土地改革涵盖的范围很广,涉及到了台湾一半以上的农户。三是土地重新分配采用真正的单一模式。四是迅速采用了一套辅助性的配套措施,包括信用的提供、推广服务的成立及对农会在组织上有力的支持与对传统性农业的继续投资。通过土地改革,台湾的农业收益与农业生产量有了显著的增加。从1948起,除1963年例外,农民净收入均较1948年相比逐年增加,且总净得中,土地改革后增加的所得,与1948年增加所得比较,两部分的百分比呈递增变化。这最后一项的变化可以说是农地改革的间接影响所致,一方面要归于农民生产意愿的增加,另一方面也应归功于台湾政府的农业发展措施(表14)。

表14 台湾农地改革粮食增产后农民收益情况

Table 14 Farmers' income after grain increase of Taiwan farmland reformation

年份 Year	年两期稻谷总产量 kg/ hm <sup>2</sup> Total grain yield of two stages	农改前农民所得 kg/ hm <sup>2</sup> Yield before agricu- ltural reformation	农改后增加净得 kg/ hm <sup>2</sup> Increase after agricul- tural reformation	较1948 年增产所得 kg/ hm <sup>2</sup> Yield in crease compared with 1948	农民净得总量 kg/ hm <sup>2</sup> Ttd yield	指数 kg/ hm <sup>2</sup> Index	农民净得总量 年 两期稻谷总产量 %
1948	3 894	1 947	-	-	1 947	100.0	50.0
1949	4 248	1 947	487	354	2 788	143.2	65.6
1950	4 822	1 947	487	928	3 362	122.7	69.7
1951	4 916	1 947	487	1 022	3 456	177.5	70.3
1952	5 216	1 947	487	1 322	3 756	192.9	72.0
1953	5 388	1 947	550	1 494	3 991	205.0	74.0
1956	5 786	1 947	550	1 892	4 389	225.4	75.8
1961	6 604	1 947	550	2 710	5 207	267.4	78.8
1962	6 851	1 947	475	2 957	5 379	276.3	78.5
1963	7 239	1 947	1 633	3 345	6 925	355.7	95.6
1971	7 910	1 947	1 510	4 016	7 473	383.8	94.4
1980	9 277	1 947	1 817	5 383	9 147	469.8	98.6

注: 资料来源于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中民国中山学术会议论文研讨集(第四册)》。

Note: Data came from the Discussion Set of Zhongshan Academic Conference Paper.

台湾土地改革非常的成功,甚至堪称一个经典案例而名扬四海。土地改革为台湾的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安定了农村社会、增加了农业生产,间接地为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1953年开始,台湾开始实施“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政策。也正是由于农产品生产、加工和输出得到的外汇收入,成为台湾经济发展初期工业化成长的重要资金来源,加速了台湾的经济发展,为之成为经济上的亚洲四小龙之一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再看与韩国近在咫尺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消灭了封建制度。通过对农业土地税的改革把《封建耕作税制》改为《固定现金税制》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1878~1913年,农业产出增加达40%。农业产出的增加大部分成了政府收入、经济储蓄和必要的外汇来源,也增加了国民的社会福利。从农业成长作为经济发展的飞跃准备阶段的阶段成长理论来看,台湾和日本的情况都很切合。韩国由于以上的各种原因,农业没有成为经济上涨的动力,到1970年初为使农业不成为经济发展途中的障碍,当时的朴正熙政府有必要对农业发起一场大的变革,这也是韩国“新村运动”起因的另一个原因。

#### 4 结论

(1) 政治需要方面,“新村运动”不是朴正熙的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而是朴正熙为了维护自己当时不法政权而取悦于民的一种政治手段。表面上大刀阔斧地进行各种改革,实际上还是为了自身的政权需要。

(2) 社会经济方面,随着当时工业化的不断深入,韩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的农业人口流失、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农村相对贫穷的问题越来越深刻。为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一次农村地域的大开发,成了必需采取的行动。

(3) 从农业发展自身方面把韩国的农业状况与当时的台湾和日本作了比较,从比较结果可以得出,台湾和日本的农业在各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成为当时工业投资的主要来源和外汇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韩国的农业却与此相反,到了1970年,成了工业化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从农业和农村开发在农业发展自身层面来看,“新村运动”也是当时的一种必然选择。

#### 参考文献

- [1] 金针镐. 新村运动改变韩国面貌[J]. 亚洲周刊,2006(25):32.
- [2] 金浩镇. 韩国政治体制论[M]. 首尔:博英社,1996:286.
- [3] 安海均. 韩国行政体制论[M]. 首尔:首尔大学出版社,1994:188,246.
- [4] 金东日. 行政与现代化[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154-155.
- [5] 金荣枰,崔炳善. 韩国行政改革的神话与逻辑[M]. 沈仪琳,译.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1:200.
- [6] 汪玉凯,马庆钰. 中国与韩国行政体制改革比较研究[M].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53-55.
- [7] 金元国. 关于韩国行政改革的研究[D]. 首尔:檀国大学,1991:59.
- [8] 赵锡俊. 韩国行政史的分析:1968-1984[M]. 首尔:首尔大学出版社,1987:631.
- [9] 徐太闰. 韩国政府组织论[M]. 首尔:首尔法文社,1985:223-224.
- [10] 卢政铉. 韩国行政改革论[M]. 首尔:罗南出版社,1994:179.
- [11] 朴正熙. 我们国家的道路[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 [12] 新村运动的理念和实际[C]. 首尔:首尔大学新村运动综合研究所,1981:507.

(上接第7813页)

来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上的削弱进行补偿。而在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推广中,还需要旅游者意识上的提高,真正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西部地区的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实现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旅游开发的共同进行。

#### 参考文献

- [1] 黄儒钦. 环境科学基础[M]. 3版. 四川: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 [2] 王礼先,刘霞. 生态环境建设的区域配置[J]. 水土保持学报,2002(5):17

- 22.

- [3] CEBALLOS LASCURAIN H. The future of ecotourism[J]. Mexico Journal, 1987, 2:271-274.
- [4] 吴楚才,吴章文. 生态旅游概念的研究[J]. 旅游学刊,2007(1):2-4.
- [5] 李清源. 西部生态建设的制约因素分析及策略选择[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20-23.
- [6] 杨阿莉. 增长极理论对西部生态旅游规划的启示[J]. 开发研究,2006(6):79-82.
- [7] 国家环保总局. 生态功能区划技术暂行规程[S]. 2002.
- [8] 保继刚. 颐和园旅游环境容量研究[J]. 中国环境科学,1987(2):32-38.
- [9] 高吉喜.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承载力研究[D]. 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1999.